

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8-41

2008年5月15日

我的反思

— 給老三屆的夥伴們

美國威靈基金會董事長 徐浩淵

盯著好不容易定下來的標題，我手中的筆異常沉重。40年了，比我們老的人、小的人、中國人、外國人都在言說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只有我們自己，這段歷史的主要當事者和見證人，一直保持著沉默，任人褒貶。有心理學常識的人都知道，只有在幼年或童年時期，心靈受過重創，傷口未曾癒合的人，才不能回顧過去。而且，受傷的程度與抗拒回憶的強度是成正比的。什麼是我們的心理傷痕？它給我們的生活，我們的後代，給整個社會什麼樣的影響？我們對過去、現在和未來負有什麼樣的歷史性責任？作為老三屆的一員，我試圖在回憶和思考中尋找答案。

一、誰是老三屆

老三屆，是指 1966 年的時候，六個年級的在校中學生。中國的中學是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按照畢業的年頭稱呼。人們把當時正在初、高中的這三屆即將畢業生，統稱為老三屆。按照規定，孩子七歲入小學。經過六年小學畢業後，進入初一的學生是 14 歲，在高中三年級的是 19 歲，恰恰是美國人最頭痛的青春期的青少年 — Teenagers。這個年齡群體，身心與情志發育迅速，處在從兒童向成人的過渡時期。他們強烈要求“做大人”的權利，卻不能承擔成年人享有這些權利時需要負的責任。他們純潔、敏感、熱情、富於幻想，同時具有過多的能量，很少的生活經驗。在特定的環境下，非常容易走向極端，甚至出現暴力行為。美國近十年來，青少年謀殺率增長了三倍。40 年前，中國的中學生則處在一個更加矛盾深重的社會現實裡。

1966 年的這批青少年，是在 1949 年前後出生，和新中國一起成長起來的。1949 年以後的中國，結束了一百多年的戰亂，也結束了外國列強對中國的欺壓和凌辱。開國大典時，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佈的那句話：“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！”說到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裡。此後，農民分到了土地，工人是理論上的領導階級。全國老百姓從心底裡相信，自己是新中國的主人。在朝鮮戰爭中，中國人把美國佬從鴨綠江邊一股腦兒地打回了“三八”線。之後，又和想要轄制中國的俄國佬翻了臉。連人家撤走所有的經濟、技術援助也擋不住中國人要恢復民族自尊的決心。同時，中國又陷入了二百年前的閉關自守狀態之中。

此時，中國的意識形態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混雜體。雖然馬列主義被確認為“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”。但是，幾乎沒有共產黨員和幹部讀過那些從西方傳來的艱深著作。人們盲目地相

信：我們只要忠心耿耿地跟著毛主席和共產黨走，每天辛勤地勞作，終有一天會走入一個叫做“共產主義”的人間天堂去。至於這個天堂是什麼樣子？什麼時候能夠走到？為什麼一定會走到？沒有人問過，也沒有人懷疑過，近似於一種宗教性的虔誠。這種信仰的進一步發展是“世界革命”的理論。“文革”以前的中國人民相信，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，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等著我們去解救。我們肩負著解放全人類的光榮、艱鉅、神聖的歷史重任。

“文革”以前，儘管有過“鎮反”、“三反五反”和“反右”等運動，畢竟僅僅觸及了少數人。絕大多數青少年所感受到的是學校和社會上的所謂“正面教育”。但是，除了數、理、化的知識性教育以外，學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極端矛盾的。一方面，在學校裡，學生被學校中的官辦組織“少先隊”、“共青團”管理起來。教育孩子們“絕對服從組織”和“做黨的馴服工具”。另一方面，在社會上，所有的文學、藝術和舞臺上，都歌頌著新中國締造者的光榮歷史：他們青年時代大無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義行為，成為孩子們的榜樣（Role Model）。這兩種方向完全相反的思想教育，對於青少年的心智形成，造成一對可怕的精神衝突。導致了他們在即將來臨的“文化革命”的大動亂中，產生令人們（包括我們自己）至今難以理喻的行為——壓抑與反壓抑，暴力與破壞，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，等等，等等。

“文革”以前，很少有孩子對當時的社會懷有仇恨。但是，根據孩子的家庭在社會中所處的不同地位，他們對於上述的矛盾性思想教育有很不同的反應。所謂“出身不好”的孩子們，即：地、富、反、壞、右的子女，有一種類似西方的基督教徒們特有的原罪感。他們認為自己的“根子不正”，不得不同親生父母“徹底劃清界限”，皈依真理，淨化靈魂，以便做一個被公眾承認的

好人。共產黨和毛主席都是抽象的概念。學校裡的校長、老師，特別是黨、團組織便無形中成了他們的“精神父母”和他們在社會上的合法保護人。因此，當他們看到其他的孩子叛逆的時候，總是感到特別的不舒服。因為這種行為，不僅威脅了他們精神上僅有的安全寓所，而且觸動了埋藏在他們更深的潛意識中的叛逆衝動，即大聲地對自己和別人說：“生我，養我，愛我的爸爸媽媽也是好人，我愛他們。”這是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天性與權利。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中，這種願望成了罪孽，是“劃不清界限”的表現，絕對不利於他們的生存。自然也不可能浮現到意識中來。因此，這些孩子最容易趨向“馴服工具”的教育。在“文革”的開始階段，“誓死保衛學校領導”，做了真心實意的“保皇派”。

所謂“出身好”的孩子，即：工、農、幹部子女。因為他們的父母親是“領導階級”，這些孩子們從生下來那一天起，就感到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。毛主席說過：“世界是你們的，也是我們的。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。你們青年人，朝氣蓬勃，正在興旺時期，好像早晨八、九點鐘的太陽。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。”在這種充分被肯定、被信任、被期望的精神環境裡長大的孩子，具有非常的自信和社會責任感，同時也伴隨著狂妄自大和過分的天真。特別是幹部子女，從“造”了自己祖父母“反”的爸爸、媽媽身上，從小汲取著“造反”的精神。恨自己怎麼晚生了幾年，沒有趕上電影裡面那種激動人心的戰爭年代，沒有機會也做一次英雄。這些孩子更加容易接受“正面思想教育”的另一個側面，即：他們父輩的“反叛”和被文學藝術詩意化了的“革命英雄主義”。對學校中“馴服工具”的教育則很反感，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。

記得從小學開始，我雖然一直成績優秀，是文藝、體育活動中的活躍分子，但是每次學校老師給我的操行評語都少不了“驕

傲自滿，紀律散漫”的批評。上初中以後，看到有的同學把自己的錢包交給老師，聲稱是“路上撿的”，而被老師作為“學雷鋒運動”中的好人好事表彰。使我這個本來對這樣的運動就不感興趣的人，產生厭惡。在黨的“重在表現”的感召之下，為了加入共青團，特別是“出身不好”的同學最願意找“團組織”彙報。不單彙報他們自己的“壞思想”，還要捎上我那些不服從管教的“壞行為”，使我常常因此而挨批評。團組織追著要我克服“自來紅思想”，連“出身好”也有了“原罪”。對於這種宗教式的壓抑，我實在反感。做了父母親的人都知道，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如同皮球。你越拍它，打它，皮球反而跳得越高。我當時的情況恰好如此。久而久之，這種壓抑與反壓抑的能量不斷蓄積。同時與“小彙報”我的同學，形成越來越深的隔閡。這種現實，為後來“文革”的大火首先從中學裡燒起來，學生之間大打派仗，埋下了基礎。

提起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人們異口同聲地將賬算到了毛澤東一個人頭上，將十年的大動亂歸咎於共產黨內的政治鬥爭。為了解析“文革”的起因和社會後效，中、外學人花費了不少人力、財力。他們收集了大量的史料，研究毛澤東和“中南海”裡的宮廷鬥爭。甚至細碎到了，某年某月某日，某某給某某打過一個電話，使了一個眼色，寫了一個便條……使我不禁想起“紅學家”們研究“紅樓夢”的情景。人們似乎忘了，這段歷史是我們五千年文明史的繼續。其真正“史無前例”性，恰恰在於全國幾億人民統統發動起來折騰，最終“觸及了所有人的靈魂”。

1958年，缺少現代科學知識的毛澤東，憑著主觀的想像和願望，發起了一場經濟生產的群眾運動，名曰“大躍進”。餓死的上千萬農民使得毛澤東感到罪過。雖然幹掉了“為民請命”的彭德懷，壓住了黨內的批評意見，毛卻漸漸陷入一種日益嚴重的猜

疑心態。特別是赫魯曉夫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公墓裡拉出來燒掉以後，毛變得更加恐懼。生怕他死以後，遭到同樣下場。一個人陷入這種恐懼症心理，他對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感知（Perception）都是扭曲的。看任何一個文藝作品，都會認為是在影射自己。聽他人一句玩笑，都會猜疑人家“別有用心”。這是為什麼“文革”以前，雖然在現實生活中看不到“階級敵人”，但是在中央文件和報刊上的宣傳中，“階級鬥爭”的鼓點卻越敲越緊的原因。直至在“文革”中揪出一個又一個“中國的赫魯曉夫”還不放心。通常的政治鬥爭，是以利益集團為單位，實際利害的爭奪與平衡為內容的。參加爭鬥的各方勢力，至少很清楚對手是誰。但是這種由於最高權威者心態失常而發起的討伐，使得被討伐者至死都不明白原由。劉少奇臨死前，還書呆呆地爭辯“這種把黨外的力量弄進黨內來解決問題的做法，是違反黨章的。”中國帝王和家長的話就是章法。再加上恐懼症，其思想與行為就更加無法無天、無常理可言了。這種封建禮教的遺產，與“文革”初期發展出來的類似宗教式的崇拜狂熱攙和在一起，把中國推向一場難以避免的災難。如果用行為、心理學的方法將“文革”的前後、上下徹底地分析，需要著書。在這裡，還是回到我們自己——老三屆這個群體來。

二、文革中的“老三屆”

（一）紅衛兵是“反革命組織”

提起紅衛兵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一個毛澤東創造的“革命組織”。其實最初的紅衛兵是一個中學生的自發組織。它短短的六個月歷史，有四個月站在了“無產階級專政”的對面，作為“現行反革命組織”。

1965年底開始批判“海瑞罷官”；1966年初批判北京市委的高級幹部“三家村”。中國人有了“山雨欲來風滿樓”的預感。成年人有了“反右鬥爭”的教訓，提心吊膽地猜測這次“運動”的“方向”，防範自己不要昏頭昏腦地變成了“革命對象”。可是中學裡的這批不知事的娃娃們，早已不甘心天天坐在教室裡“死讀書”，嗅到了一股盼望已久的火藥味，變得異常興奮。可算等到了他們要做英雄的時候了。要自己獨立的人格。要像父母小時候一樣，自己也闖出條路來。1965年，《中學生》雜誌上刊登了16歲的宮小吉寫的短文〈五分的秘訣〉，向當時的教育制度挑戰。北京第四、第六、第八中學已經鬧過一次學潮，被黨中央的“四清”小組勉強壓下去。此時，中學生自發的個性解放情緒和行為，還沒有同毛澤東的“階級鬥爭”聯繫起來。所以“階級鬥爭”的敵人是誰？在哪兒？誰也搞不清，也沒有人去問。

1966年3月，北京清華附中的駱小海寫了〈造反精神萬歲〉的小字報。5月，十幾個學生偷偷地跑到圓明園的遺址，成立了一個自己的組織，名叫“紅衛兵”，立刻就被打成了“現行反革命”。在一黨專政的中國，絕對不允許任何人私下裡成立什麼組織，對共產黨的孩子也不例外。“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”。60年代初，以郭沫若的長子郭世英和一個將軍的兒子孫經武為首，101中學和北京大學的幹部與知識分子的子女，偷偷地組織了一個“X—社”。X，這個數學中的未知數，象徵著他們開始對所有被灌輸的“已知”概念的挑戰。對於當時一些難以自圓其說的理論問題和社會現象，包括幹部階層的問題開始質疑。X—社被發現以後，乾乾脆脆地被劃為“反動結社”，其成員全部打入牢獄。“文革”初期，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。對於目前市面上盛行的說法：“紅衛兵”的成立，是幹部子女要求更多的特權，我實在難以苟同。古、今、中、外，哪一個朝廷，是被自己的後代

要求更多的權利而造了反，由此而演進向前的呢？

1966年，我是北京人大附中的高一學生。為了支持已經被打成“反革命”的清華附中的學生們，我們十幾個同學在自己的學校成立了紅衛兵組織，立即也成了“反革命”。從6月初到8月初，兩個月的時間裡，每天的日子就是被其他學生圍攻、辯論。“在共產黨領導下造反，就是造共產黨的反！”“紅衛兵的目的是不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？”當時同我辯論最兇的學生之一，就是共青團的幹部——魏京生。工作組找去談話，強制解散。我們的父母親更是急得不行。他們認定了自己的孩子要成為“右派分子”。壓制“退出”的威脅甚至昇級到要“脫離父——子、女關係”的地步。事實上，北京市和“團中央”的“黑名單”，已經將北京市的五千名造反的中學生列為“現行反革命”，準備在運動結束時發落。

對於十幾歲的孩子來講，受到整個社會和家庭的反對，還能挺得住，已經不單單是青少年的逆反心理能夠解釋的了。回想當時，我最基本的自我概念從未動搖過，即：我是一個好人。我的紅衛兵夥伴們也都是好人。那麼，將好人打成“反革命”的行為一定是錯的，甚至是幕後有人謀劃的，可能就是所謂的“階級敵人”。我們還相信，如果毛主席知道了他們這樣搞法，肯定不會答應。此刻，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起了作用。銀幕上的革命先烈和我們的父母，都是經歷了各種苦難還堅持革命的。所以，沒有苦難，沒有危險，沒有壓力，就不算是真革命，就錘煉不出真的英雄。所有這些，現在聽起來極其荒唐可笑的信念和邏輯推理，卻扎扎实實地支持了最初的紅衛兵的造反行為。

（二）紅衛兵與紅色恐怖

7月26日，當我們在“水深火熱”中抗高壓，毛主席在長江

裡“勝似閒庭信步”下定了決心。他老人家8月6日突然回到北京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，讓“中央文革小組”列席。並且，宣佈了自己的老婆——江青是小組副組長。從此，這個半瘋的女人走上了朝思暮想的中國政治舞臺，開始了她對自己坎坷人生經歷的報仇雪恨。8月8日，中共機關黨報——《人民日報》發表了“十六條”，第一次宣佈了“文革”與過去所有“運動”的本質性區別，是一場“自下而上”的“群眾運動”。8月初，江青和“中央文革小組”在天橋劇場接見了紅衛兵。她用極其富有情感的聲調說：“毛主席讓我問你們好！你們是小太陽！”哇！果真他老人家和我們心連心。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孩子們哭了，笑了，發瘋了！這是他們有生以來，第一次做了一件被大人反對，被所有的人反對，但是被偉大領袖支持的正確的事情！《人民日報》登載了他們的文章。他們自己的組織一下子變得全國到處都是。8月18日，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前輩在天安門上同他們握手，還戴上紅衛兵袖章。所有畫書、電影上的事情都變成了現實。只是，其中衝鋒陷陣的不再是戰鬥英雄董存瑞和黃繼光，變成了我們自己！到此為止，中學生自發的叛逆行為和毛澤東自“大躍進”之後的又一“創舉”匯合起來，開始了一場皇帝領導子民對其朝廷造反的“史無前例”的群眾運動。記得“8.18”那天，我的紅衛兵戰友們去見毛主席，我卻躺在紅衛兵指揮部裡聽廣播，感到一種極度興奮後的疲乏。眼前的世界一下子變得廣闊無邊。不再是一間小小的教室中的書桌，不再是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工作的規範之路。革命將把我們帶到哪裡？我感到有些悵惘。

嚴酷的現實很快地將我拉回地面。“8.18”以後，紅衛兵走上社會，開始了一場暴力行為。我的小紅衛兵戰士解下腰間的皮帶，劈劈啪啪地開始打校長、老師、工作組，甚至自己的同學。路上隨便什麼人被指控為“流氓”，一群孩子就會湧上去打。我從小

沒挨過打，也沒見過家長和老師打人。偶然碰到男生欺負女生，我都給以堅決地反擊。這種侮辱、虐待他人的行為，無論如何不是革命。由於反對打人，我被紅衛兵會議批評“落後於群眾運動”，應該好好讀“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”。“革命不是請客吃飯，不是作文章……”就是要將這些階級敵人“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隻腳！”我的爭辯是，毛主席制定的“三大紀律，八項注意”還算不算數？對待俘虜還不得打罵、虐待呢。當時任何人要想辯論，不引用毛主席語錄就很難開口了。情況越來越嚴重。我和清華附中、北航附中紅衛兵商量寫了一個〈三校紅衛兵聯合聲明〉。中心目的是制止亂打、亂抄的“轉移鬥爭大方向的行為”。記得那是一個濕熱的夏夜，我們坐著吉普車進城去散發傳單。車開到西單口上，突然看見一個 20 多歲的小夥子，騎車拚命追趕我們，手裡拿著一張傳單。我以為我們的車子掉了什麼東西。停下車來，那人衝上來握著清華附中卜大華的手，激動地說：“我是工人出身（說話先要報出身）。你們寫得太好了！這才是毛主席的紅衛兵……”餘下的話我已經聽不進去了，只感到一種刺心的疼痛。掠過我腦海的話，40 年來一直跟著我：“紅衛兵脫離人民了。”

回想 1966 年 8 月的紅色恐怖，出手打人的孩子們有三個特點：女生多於男生，初中生多於高中生，平日裡性情溫和和 8 月以前做了“保皇派”的學生打得更兇。一位當時僥幸餘生的女子中學的校長，至今也想不通。為什麼打她最厲害的，是她平時最心愛的學生。1995 年我回北京，碰到一個當年打人有名的姑娘。如今做了媽媽，自己的女兒恰恰是她 1966 年時的年齡。這位紅衛兵媽媽恢復了“文革”以前的溫文爾雅。把女兒管得特別嚴謹，好像生怕她去做什麼不好的事情。

初中女孩子是 14 至 16 歲，正處在青春發育期。她們血液中

的激素水平直線上昇，加上每個月的週期性變化，是情緒最不穩定的群體。中國當時的法律已經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條件，女孩子們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要解放。但是幾千年的習慣勢力，使得社會上依然用一些壓抑她們天性的看法去規範她們的行為。例如，女孩子應該文靜、賢慧、順從。這種矛盾的社會條件在她們的心理上形成衝突。平時特別聽老師話的女學生，往往是壓抑她自身情感最嚴重的女孩子。“文革”初期，一般是“誓死保衛校領導”的人，8月以後，突然成了“保皇派”，她們一下子覺得受了欺騙，平時積壓的情緒能量突然爆發出來，發泄到過去她們特別敬愛的人身上。愛和恨原本是一種情緒的兩個極端面。在特定的環境裡，轉愛為恨的例子是很常見的現象。有的孩子在這個時期，甚至將親生父母打死，留下了終生難以平復的心理傷痕。

一個紀錄片導演訪問了頭髮斑白的老人王晶堯，他的老伴卞仲雲，是當年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學——師大女附中的校長，1966年8月，慘死在自己的學生手中。訪問最後，老人痛不欲生的話是：“這麼多年了，我一直等著。她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走來，向我說一聲：對不起。難道至今她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知道那是錯的嗎？”王叔叔，她們知道這是一個罪過。但是，還沒有力量回顧這段傷痛。我們的民族沒有懺悔和寬恕的傳統，她們只好將如此的重負壓在最深的心底，不敢去看它。假如能使您心裡稍稍好受一點，我現在站在您的面前，站在所有當年受過傷害的人面前，說：“對不起。”我們雖然也是這段歷史的受害者，但是應當有力量承擔起自己的責任。

（三）大串聯

“8.18”以後，北京的中學生不單走上了社會，而且，走向全

國。這就是“大串聯”。大串聯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走出北京城，大開眼界。過去，看著別人家幹部的孩子跟著父母在暑期去度假，我羨慕極了。很想也跑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。但是我的父親跟著周恩來工作了幾十年，自己從來不度假，當然更不允許孩子們享受這種“特殊化”待遇。所以，初二的暑假，我同另外兩個女孩子到北京郊區的蘆溝橋農場幹了兩個月的“義務勞動”。就那，也是高興的。

揹上一個小黃挎包，帶一套洗漱用具，幾件洗換的衣服，從火車的窗戶趴進車廂（大串聯時，為了防止擁擠傷人，索性開窗“減壓”進入），領略祖國的大好河山去也。中國真美呀！廈門、青島的海濱，桂林仙境般的山水，雲南橫斷山脈中，白練子般的山澗和紅得像火一樣的山茶花，至今還歷歷在目。但是，真實世界的另一個側面，也在敲擊我的心。中國的老百姓活得真苦呀！農民窮得連飯都吃不飽，到了湖南還遇到了討飯的人。我們總說要去資本主義國家解救那裡的勞苦大眾。還去哪兒呀，他們不都在我們自己的家裡嗎？所有的革命理想與信奉，第一次在我心底動搖了。從此，開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審視面前的世界，開始質疑所有被灌輸的思想，我腳下的地面開始龜裂。

我曾經為此非常的憤恨。認為我們的父輩存心欺騙我們和廣大的人民。“文革”以後，我的父親帶領一個文化團體去加拿大做訪問。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走出中國。我注意到他老人家回來後的兩週內非常沉默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對我說：“他們的人民生活得真好呀！”因為父親的聲調裡充滿了痛苦，使我不由得朝他望去。老人的眼睛裡含有一種深深的歉疚和疑問。是在責備自己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同樣的幸福生活。也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為了這個目標，工作得如此辛苦，還是沒有達到目的。此後，父親工作得更加辛苦，直到病逝在醫院的最後一息。

我想鄧小平伯伯第一次訪問美國後也會有同樣的感觸。因為“文革”以前，共產黨的幹部很少出國。他們對西方社會的概念，還停留在20世紀初，他們“勤工儉學”的年代。那時候，歐洲工人生活得的確很苦，而且沒有保障。他們不明白那只是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。在市場經濟完整化以後，整個社會的物質生活才可能提高到今天的水準，社會主義才會名副其實。如今，西歐實現的才是馬克思當年預見的社會。中國、蘇聯和東歐國家，想跳越社會的發展階段，實際結果是欲速則不達，痛苦萬分。

(四) 中學的“派仗”

從1966年8月起，北京市的中學生分成三大派：按照出現的順序，第一，是以最初自發形成的紅衛兵為核心的“老紅衛兵”，簡稱“老兵”；第二，是“家庭出身好”，但在6、7月份做了“保皇派”的學生，稱作“四四派”，人數最多；第三，是1966年11月以後，“中央文革”為了打擊“老兵”和他們的父母——老幹部，達到其篡權之目的，將“出身不好”的中學生扶起來“鬧革命”。他們的組織稱作“四三派”。這批一直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孩子們，才第一次得到了與其他孩子一樣的“保衛毛主席”的權利。當然，他們開口的第一個聲音，就是要求平等。留下的最有價值的代表性文章是遇羅克寫的〈出身論〉，曾經給予我的思想解放很大啟發。對於他因此而遭殺害，至今，使我感到非常的悲痛。

根據“中央文革小組”不同時期的不同需要，支持或打擊著北京中學生的三個不同的派別，致使他們此起彼伏，你上我下，自相殘殺。全國的各種地方派別和派仗的情況，大同小異。可謂歷史上最“波瀾壯闊”的“挑動群眾鬥群眾”。利用這些力量揪出了“中國的赫魯曉夫”劉少奇以後，三派學生都完成了其“歷

史使命”。1968年，在偉大統帥的一聲令下，所有的中學生結束了派仗，統統開赴農村。

（五）上山下鄉

無論毛澤東當年把這批十幾歲的娃娃趕到鄉下去的目的是什麼，這幾千萬知識青年是在中國的黑、黃、紅、白土地上開始成人的。大多數學生帶著革命的熱情和決心，打算到“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”，改變農村的“一窮二白”面貌。結果，他們沒有力量改變窮苦的鄉村和農民，自己卻扎扎实實地被改變了。同農民一起度過的艱辛歲月，使他們每一個人從群眾運動的雲端，落回到地面，第一次開始思索人生與人世的真實涵義。

我和另外的四個中學生選擇在河南輝縣插隊。背靠著太行山，面對著一望無際的華北大平原，開始了農民的生活。每天，頂著繁星上工，披著夜露回家。吃著自己煮得夾生或燒焦的飯。點著小油燈讀幾行孟德斯鳩的“波斯人信笈”。冬閒時，扒火車（沒錢買票，偷坐車）回北京，看望別的地方農村回來的知識青年朋友。討論會，辯論會，“中國向何處去？”“中國農村為什麼這麼窮？”“大寨是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？”“中國的現實階級應該怎麼劃分？”文學、藝術、音樂、哲學，無奇不有，海闊天空。這時，社會上猶如歐洲的中世紀（The Middle Ages）一片黑暗。但是這些知識青年的地下討論會，和被現代人稱為“地下沙龍”的自發性文學、藝術的學習和創作，猶如一線曙光，穿透“文革”初期對毛澤東的宗教式崇拜，開始了思想啟蒙的征程。1969年我開始意識到，為了現代化，中國必須發展市場經濟。但是，這種想法與當時絕大多數人的思想相距太遠。在大型的討論場合，只好用近似哲學推理的方式隱晦地表達。同知近的朋友談起，也被

扣上一頂托洛斯基的帽子。我只好回到文學、藝術的人性解放題目中去。

從農村回來的學生們，開始打破了“派仗”時期的界限，也打破了“文革”以前由於家庭出身不同而造成的隔閡。所有的人都是大自然的兒女，都是農民的孩子。一個鍋裡的小米粥把大家“煮”到一起去了。什麼“黑五類”、“黑幫”子女，統統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。想當初，《人民日報》天天叫喊“革命大聯合”從來無人理睬。此時，共同的理想破滅，共同的日曬雨淋，希望和失望的折磨，戀愛和失戀的痛苦，著著實實地把這批青年人連在一起。這種從思想到群體行為的進化，給“文革”之後的改革、開放，做好了準備。

（六）我當了兩次“政治犯”

文化大革命十年，我被抓進監獄兩次，做了兩次“政治犯”。第一次是1967年，我是18歲。主要“罪名”是1966年底寫了一首大罵江青的詩。我聽到江青竟敢組織大會，鬥爭我心目中的大英雄陳毅伯伯，勃然大怒。陳毅從小即是一個有正義感，有同情心的孩子。看到他當縣官的舅舅打一個老百姓，忍不住大哭起來。他是沙場上威風凜凜的勝將元帥。外交部長當得腰桿又直又硬，給中國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爭了光榮。被這個靠同男人睡覺，爬進共產黨來的壞女人欺負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我提筆寫了一首“滿江青”，抒發憤怒。“四十餘年廉頗將，今日敗倒茶花女”的詩句表達了很多人自己不敢表達的情緒，被傳得全國到處都是。1968年我同一大批“學生政治犯”經過“少管所”的“學習班”以後被釋放。同期出來的還有“老兵”董良騶和楊小陽，以及“5.16”集團的主要幹將等人。

第二次被捕是 1976 年，我正在河南醫學院讀書。據說我在江青的黑名單上，北京方面又發難下來。“文革”十年裡，我始終堅持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，所以，“黑材料”被人又攢了厚厚的一大堆。被抓的時候，我正在新鄉市人民醫院裡實習。押解我回鄭州的路上過黃河。我看到黃河的水少、沙多，很是難過。心想：不知我們苦難的中華民族，何時才能清除這些鬱積的泥沙，痛痛快快地向世界的大海。

我知道自己這一次是很難活著出獄了。索性在提審時，和預審員展開大辯論。我的預審員是一個很正直的老頭，名叫張子冉。看得出他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，這時已經感到了“四人幫”的倒行逆施。因此，每次“辯論”他都輸給我。有一次他氣得拍著桌子大喊：“到底是我審你，還是你審我！”我實在忍不住笑了起來，逗他：“我真的不知道咱倆，誰該審誰。”“四人幫”倒臺後，我平反出獄。張老頭到我父親那兒告狀，說：“你那傻妞脾氣真賴，進了監獄還大吵大鬧，繼續給自己增加黑材料。我想護著她，都護不過來。”

回想當時我腦子裡經常浮現的是“抗日”英雄吉鴻昌烈士的形象，和他那句詩：“國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頭”。我還以為自己已經和“17 年的教育”bye-bye 了呢。連我出身的階級都“反”掉了，馬克思的毛病也找出來了，還不夠徹底嗎？誰知，在認知、意識層次裡的變化，並沒有那麼強大。童年被印下的英雄主義，至今在我潛意識的原始情感層次裡，怕是永遠也不會消失了。

三、老三屆在中國的今天和明天

中國保持著人類歷史中，群眾運動記錄的絕對世界冠軍。幾千年來，幾百次農民起義，曾經多次地推翻了朝廷。民不聊生就

要造反。自己當了皇帝以後，又重複老朝廷的活法，循環往返。直到 19 世紀，西方的洋人用洋槍洋炮打進來了，中國人才發覺比人家落後了好多年。洋人還帶來了洋思想。20 世紀以來，學生也開始造反。中國共產黨的造反運動是“農運”和“學運”的大聯合。打下來的天下，留有封建時代農民坐江山的味道，卻是冠上了西方左翼思想的帽子——馬克思主義。這種東、西方文化的攙和，以及現實和理想的矛盾，導演了中國近代史所有的悲劇與喜劇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全民運動”中，把這對矛盾推到了極至，粉碎了不實際的理想，終於走上了現代化的軌道。

今天，我的老三屆的夥伴已經是四、五十歲，進入不惑之年的成年人。他們有的在中國的黨、政、軍的機關裡任要職，有的成為鉅型財團的總裁，有的是海外的學者或鉅富，有的成為挑大樑的新聞記者，成為校長、教授、老師，有的在最基層是普通的勞動者。但是，無論他們的職位高、低，人窮，人富，無論他們是在城市、鄉村，還是遠在大洋彼岸，這一代人，仍然具有基本的同感與共識。有的人還在擔心，生怕這個在 60 年代振盪過中國的群體，有一天，還會掀起更大的風暴。其實，作為個體的心理形成，接受環境影響的關鍵時期（Critical Period）是人的一至十歲。老三屆的這段年齡，恰恰趕上了新中國成立後，那段最平靜、美好、充滿了向上和建設精神的日子。在這個年代長大的孩子，無論此後他們經歷了何種動盪與苦難，他們的認知、情感的基礎，依然根植在建設性的土壤裡。相反，最應該令人憂慮的是“文革”時出生的孩子們。他們的關鍵成長時期，是中國充滿了扭曲、混亂、是非顛倒、爾虞我詐的年代。這些破壞性因素，滲透在他們的潛意識中，爆發在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裡。“六四”以後，中國政府進行了統計。調查結果表明，興奮跳躍的多是 30 歲以下，45 歲以上的人們。偏偏只有老三屆，結結實實地站在那裡，紋絲

不動。他們從自己的經歷中明白了，中國要想走向真正的自由、民主，最重要的是安定地發展。一次“文革”的教訓還不夠嘛？人要流多少次血才能學會這個簡單的真理呢？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是用流血換來的。民主社會的現實基礎，只能建立在一個數目龐大的，有著良好教育水準的中產階級之上。要想造就這樣一個中產階級，唯一的路是穩定的市場經濟的發展。所有所謂的“社會主義”國家的歷史悲劇恰恰在於，人們夢想在貧窮和無知的土壤裡，種植民主政治之果。蘇聯正是還想做一個“民主政體”的跨越，才弄得國破人亡，流離失所。二百年來，中國人民已經歷了太多的苦難，不會容忍任何人，拿 13 億人的身家性命再做一次試驗了。

當 21 世紀來臨之際，新中國的兒女老三屆肩負著承上啟下的重任。和大家一樣，我也在辛勤地努力。為了避免“文革”式的社會大災難重演，為了使億萬受過傷害的心靈得到醫治，我正在幫助中國建設一個自己特有的精神衛生系統。為此，成立了威靈基金會 — WorldLink Foundation，給中、美兩國的心理工作者架一座交流、互助的橋樑。另外，計劃寫一本書，把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路歷程記錄下來。讓世人對 50 年來的中國，對我們，有一個更深刻地瞭解和理解。也讓我們的孩子們知道，他們的父母是怎樣和新中國一同經歷了苦難，而成長起來的。

中國，即將在我們手裡成為世界上最富足、強盛、和平的偉大國度。